

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

—— 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by Michael Lindsay

根据英国伦敦贝尔斯特洛姆和波伊勒公司
1975年版经作者增订后译出

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

——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

〔英〕林迈可 著

杨重光、郝平 译

李效黎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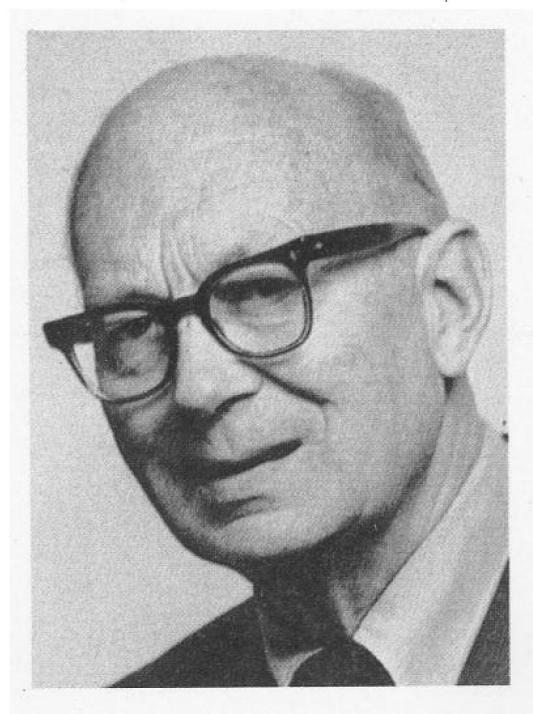
245×253 毫米 12开本 10印张 248千字

1987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7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11345.006

I S B N — 7 — 8004 9 — 01 7 — 3 / K 01

定价 12.50元



Michael Lindsay

林邁可

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

——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

〔英〕林迈可 著

杨重光 郝平 译

李效黎 校

❶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七年·北京

八里市日新街州县国英

林邁可夫人李效黎
大人先生



周恩来
一九五四年二月北京

1954年本书作者林迈可和夫人李效黎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华。
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以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为首的代表团全
体人员，在和平宾馆合影。

作者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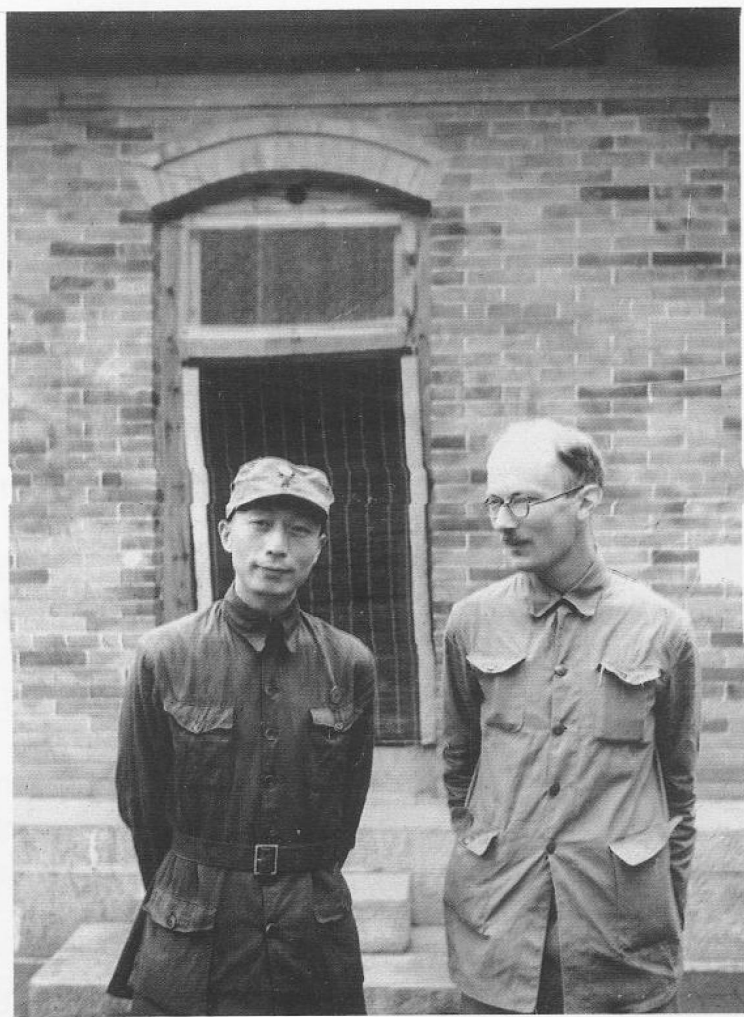
林迈可先生 (Michael Lindsay —— Lord of Birker) 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历史学家，在苏格兰格拉斯哥的神学院任院长多年。他的父亲是一位哲学家，在牛津大学的贝里奥学院 (Balliol College, Oxford University) 任院长二十五年，直到退休为止；1945年起为英国上议员并被英皇封为男爵。

林迈可自己起先在牛津大学学自然科学，后又学经济学、哲学及政治学。大学毕业后，他从事成人教育，担任南威尔士州工业调查所的所长助理，1937年受北平燕京大学之聘为经济学导师，并领导创办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

那时北平是在日本侵略者的盘据之下，他曾利用数次假期之便，到华北的抗日游击区，目睹根据地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0年，他曾在重庆任英国使馆新闻参赞六个月，后受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博士之召，复返燕京大学执教。

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珍珠港，日美正式开战。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立即被日本宪兵队看管。林迈可与其妻李效黎女士匆忙出走，经八路军帮助进入了八路军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和延安参加抗日工作，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林迈可夫妇方携其一女一子回英国。



聂将军会见林迈可 (1942年)

出版说明

今年七月七日是中国对日抗战五十周年纪念日。我们谨将英国友人林迈可先生1975年所著英文版《鲜为人知的战争：华北1937—1945年》（即《抗战的中共》，最近经作者增订）译成中文出版，献给抗日战争五十周年，作为纪念。

林迈可先生原是燕京大学英籍教师，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曾在沦陷后的北平秘密为八路军作过一些事，珍珠港事件后逃离北平，由八路军帮助进入晋察冀边区，在晋察冀和延安工作到抗战胜利。他与抗日军民共患难、同甘苦，为共同的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书是林迈可先生对其不平凡的经历的记述，连同他拍摄的许多珍贵照片，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在当时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拍照已很不易，而在战争环境下能长期保存下来更为难得。

我们希望本书会使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同志回首当年，留下美好的回忆；使年轻一些的同志得到启发，了解胜利来之不易；还有助于不太了解情况而愿意了解情况的人们知道真情，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书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同志（如戴新民同志）热情的帮助，谨表谢忱。

中文版序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愿意出版我的英文画册《抗战的中共》的中文版，我得到这个消息觉得非常欣慰。因为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世界上很多地方几乎很少有人知悉。近几年来，我和我妻子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地遇到了很多华侨和华裔人，他们都很急切地向我们询问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真的抵抗过日本侵略军吗？”尤其在美国，近年来从台湾来的中国人很多，他们更迫切地要我们证实：中国共产党是否确实参加了抗日战争？有些学生甚至很坦白地说，他们在台湾听到的是中共在抗日时期“按兵不动，坐享扩大军队和地盘，进而准备控制全中国。”有的学生对台湾的这种说法有疑问，需要我们从我们口中听到实情。

对于华北八路军抗日战争的事情，我们是百分之百地有权来证实的。我自己可能是以外国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的很少几个人之一。我因偶然的机会第一次目睹了他们与强大的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情景。中国共产党在极其困难的物质条件下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领导的军队连最基本的给养、武器都没有，而国民党中央政府和他们在山西的掌权者阎锡山却不予以帮助。

物资缺乏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坚决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的信念。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军事行动都极合乎民心，他们将人民组织起来，同人民共患难。部队是由游击区老百姓的青年子弟兵顶大梁，青年妇女也投入了各种合适的工作，有的参加妇女救国会工作，有的在家负担起生产粮食的重任，年老的在家看孩子，给部队做布鞋，护理受伤的八路军战士，真是军民一条心。我从我的工作接触中体验到，中共的领导者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

在我这本以照片来反映抗日战争的历史史实的画册中，也记述了我和我的妻子及孩子们和八路军一起生活的情况。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每次残酷扫荡，都是由于八路军担任警卫才使我们安全脱险，而每一次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关心和帮助。

这本画册没有详细记述八路军在战场上对日军作战的情况，这是因为当时我没有直接参加在战场上对日作战。而这些在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将军的回忆录中，在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回忆录中，已经有了很丰富的记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于北京大学

绪 言

一些作家曾经提出，毛泽东主席对他在延安度过的时代有一种很深的怀旧感。这种情绪不能认为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成绩卓著，它真正可以被称作中国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1937年他们开始管辖着一个大约有一百万人口的地区，拥有一支大约三万人的军队。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们已管辖着一个几乎有一亿人口的地区，拥有一支九十万人的军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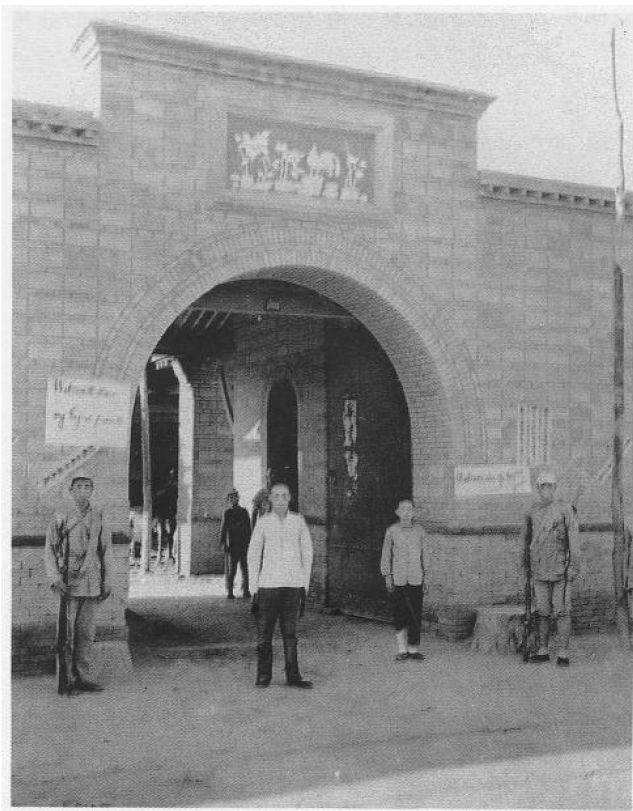
关于延安和它周围的城乡——陕甘宁边区——已经有过大量报道，而有时人们在谈论对日作战期间共产党管辖的区域时仍然提为中国“西北”地区。若陕甘宁可以被称作西北的话，则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力量全都是向东方和南方扩展的。到1938年夏天，他们已经拥有几块比陕甘宁边区有更多人口的根据地。1945年春天，我试图估算共产党管辖的区域按人口计中心在何处，并估出它大体是在冀南或鲁西，在延安东南偏东大约五百英里的地方。除去传统上称为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把共产党管辖的这些地区称作中国的东北部似乎更正确些。

延安地区是重要的，因为日本人^①从来没有侵入过黄河以西的地方。自从战争开始，除了1938年初延安老城遭受过轰炸外，陕甘宁边区未曾受到过破坏，而共产党领导的其它地区却经常地处于战争之中，并且他们的城镇和乡村有很大一部分被日本人严重破坏。诚然，延安是中共领导机关的一个合适的中心，可是，把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某些地方更象美国的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或澳大利亚的首都地区堪培拉，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它是中央领导机构的所在地。

我的大部分旅行是在晋察冀（山西—察哈尔—河北）边区，这个区域是最大的根据地之一，也是最早建立起来的战时根据地，大约有二千五百万人口。它是唯一的一个作为战争期间特殊的、具有省级政府同等权力、得到国民党中央政府承认的政权机构。那里有一个实行“三三制”^②的边区政府，直到1943年末，这



延安宝塔山（19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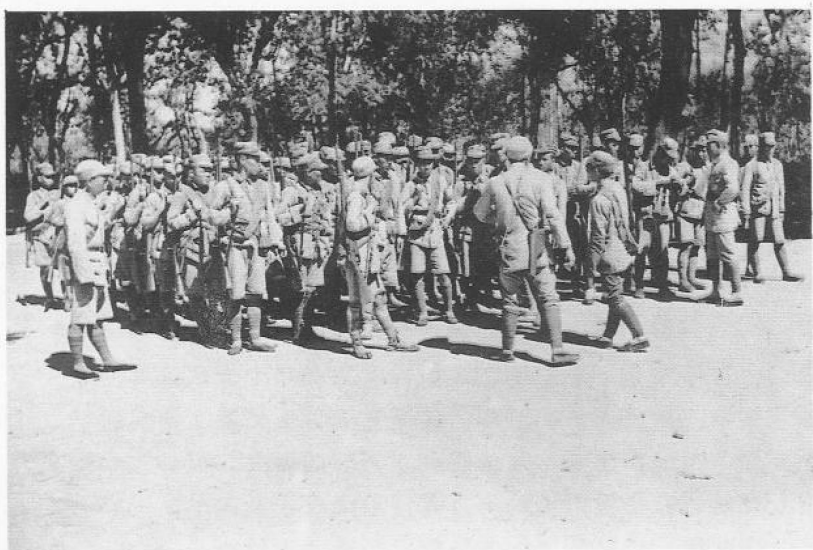


晋察冀边区政府。门口墙上有欢迎外国朋友的标语

（1938年）

① 为行文方便，本书中的“日本人”均借指从事侵略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日本军队”。——译注

②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所采取的政策，即共产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以保证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译注



冀中的八路军队伍（1938年）



冀中风光——民兵站岗（1938年）

个政府包括国民党的成员。

在战争的状况下，华北由中国共产党管辖的地区，是以被日本人占领的铁路线为自然疆界的。在平时，作为自然疆界的山区，则成了抗日组织的天然的根据地。

晋察冀的大部分为铁路线所环绕：北面是平绥路（北平—大同段），东面是平汉路（北平—石家庄段），南面是正太路（石家庄—太原），而西面是同蒲路（太原—大同段）。这一地区大部分是几乎连大路都不通的荒野的山区。平绥路和正太路相距达一百八十英里，在两路之间广大的地区，仅有一条山路通过绵亘的山脉。这些山路和这一时期华北的大多数道路一样，只不过是运输而在田野间留出来的一条狭长的地带。在地面条件处于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在路面上行驶一辆很小的卡车，更普遍的是通行骡子或牛车。而在崎岖不平的多山地区，则连一条这样的路都没有，物品只能靠牲口驮运或脚夫来肩挑背驮。1939年，我们旅行穿过那里，在将近二百英里的旅程里，连一辆独轮推车都没有看见过。

晋察冀也包括平汉路东面的冀中，它总体上是一片相当平坦的平原，可是为了军事的目的，它有着一些起伏不平的田野和壕沟，夏天高高的庄稼，特别是青纱帐——可以长到十呎高的高粱和玉米，又会将它遮住。冀中地区比较富裕，经济方面的发展也比山区兴隆——它是中国棉花的主要产区，并且在一些城市里已经发展了机械化纺织工业。1938年末，日本人开始作出一系列努力以控制华北的农村，他们不久便占领了所有的城镇。但是，除了1942年的一个短时期外，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继续控制着这一区域的绝大部分农村。1942年8月，日本军队在那里发动了一场较大的攻势，并迫使共产党领导的正规部队撤退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山区里。以至于1961年在东京，我遇到了一位前日本驻华北部队司令部的军官，他还说到，在1942年9月，一个日本军官可以不要警卫单独在冀中旅行。但是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却没能消灭共产党的组织，虽然吕正操将军告诉我，他的地方干部曾经损失了三分之一以上。1943年初，当日本军队的压力减轻了一些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又返回这里，而到了1945年，甚至从延安来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已经能够去冀中访问了。

晋察冀还包括冀热辽（河北—热河—辽宁）边区，可是，这不是一块正规的根据地。平津铁路北面的冀东地区，在1935年就已作为冀东“自治区”而受到日本人的有效的控制。1938年7月

一些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发动了一场全面的大规模的暴动，从而使日本人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达几个星期。由于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地区，而且和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相连接的交通线通过这里，所以日本人派遣了大量的军队来镇压这次暴动，然后建立起严密的控制，以防止新的抵抗运动的发展。我遇到过一个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人，他说人们甚至不能安定下来去消灭他们衣服里的虱子，因为警察经常突然地到村里来进行搜索，检查居民的良民证，逮捕从别处来的人。

晋东南荒野的山区是共产党领导的另一块根据地。直到1941年，朱德将军和彭德怀将军的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部，主要是设在那里而不是在延安。但晋南山脉少部分地区和那里的几个大一些的城镇，直到1943年还是在国民党中央政府军队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其他根据地还有处于同蒲铁路和黄河之间的晋绥根据地、晋冀鲁豫根据地、山东根据地和 New 四军所在的江苏等地区。

三十年代，中国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一直在改善它的正规部队，并为此而希望尽可能地延迟和日本进行全面战争。从纯军事观点来看，这是一项明智的政策；而从政治角度看，这项政策却颇成问题。国民党中央政府无法向人民解释它的政策。因为当这项政策正在顺利地执行时，恰恰给了日本军队的一个极好的机会，让其去抢夺它们所想得到的一切。中国民众看到的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日本人的一系列的蚕食面前妥协和让步，中国民众越来越不满意了。1937年7月7日是公认的抗日战争的开始之日，然而，在此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日本之间却在进行谈判，战争也只是被限制在平津地区。

如果日本人可以通过谈判得到更进一步的让步，以加强他们在华北的地位的话，日本军队的首脑们倒是愿意把1937年7月的战争作为一个局部事件加以解决的。但是蒋介石已不能给予更多的让步了。一个老资格的忠实的国民党员罗家伦先生，曾经向我描述过，他在那些日子里对蒋介石可能作的进一步退让感到很忧虑。当从蒋介石秘书处的一个成员那儿听说蒋已经决定派遣八个师进入河北时，他的欣慰之感油然而生。鉴于这样做是和早些时候同日本签订的一个协议内容相反的，这就表明国民党中央政府已最后决定对日作战了。（这一时期共产党的文件表明，共产党领导人担心自1937年7月以来的战争，会作为一个局部事件加以解决）。

8月底，当战争开始扩大的时候，日本人不仅在华北的平原

地区进展迅速，而且突破了隘口进入山西。在上海的战斗中，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队拖住了日本人，直到他们被在杭州湾登陆的日本人包围。

1938年初，日本人已经打败了黄河以北除晋南地区以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正规军。但是，直到1938年10月，他们很少作重大的攻击，以控制远离铁路线的农村。这就给了共产党人以机会。虽然，从1934年末到1936年的长征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军事的奇迹，它属于象英国历史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①那样的阶段。红军设法生存下来是了不起的。先前在南方和华中地区的共产党武装加起来有三十万人，1937年，甚至在地方上招募了新兵以后，红军在西北新的根据地总计仅有约三万到四万人。另外在中国南方有长征时留在那里的大约一万人，后来成了新四军。

1936年，当共产国际的路线已经从“下层统一战线”变成“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谈判开始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举行，只是由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内战才真正地结束了。直到1937年9月，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才达成一个协议，在此协议中，在北方的共产党武装被承认为第八路军的三个师，即115师、120师和129师。后来，在南方的红军留下的部队被承认为新四军，这是一支最初的兵力只有大约一万人的军队。

有证据表明，在这场战争的早期，共产党领导层内部在关于战争政策方面存在着不同意见。从一开始，就有少数领导人反对进行游击战争，而其他的领导人则提倡进行游击战争。晋察冀的一个军分区的参谋长告诉我，曾经讨论过一个进入东北的行动计划。原来期望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队能够暂时控制住某些华北平原的关口。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做到，那么热河和辽宁南部的多山地区，将成为最接近华北的适合进行游击战争的地区。

事实上，应被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的地方军阀阎锡山的请求，八路军渡过黄河去帮助山西的防卫。115师对一支通过平型关向南推进的日本军队给予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日本人却占领了山西省首府——太原，并继续向前推进。115师留在山西的东北部，那里完全被日本人控制的铁路线所包围；129师驻在山西的东南部，在那儿日本人控制着通向北方、东方和西方的铁路线；而120师驻扎的晋西北，和延安隔黄河相望。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1940年5月德军侵占荷兰、比利时并侵入法国，英国远征军和法军三十余万人，溃退到法国北部敦刻尔克地区，面临被歼灭的危险，5月底6月初，丢掉大量武器、物资，撤到英国。——译注

由于日本人仅仅控制了铁路线，所以许多农村都是政治真空地带。不少以前的地方官员随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正规部队撤离了，而众多的地方抗日组织却象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了，有些是由地方绅士领导的，有些是由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部队退却时留下的军官领导的，而其他的则由较小的地方军阀或各种政治上的积极分子所领导。共产党有能力提供具有长期进行游击战争经历的干部以抗击在装备上更优越的敌人，并在组织上较大，因而处于有利地位。

在1937年9月的统一战线协议中，共产党人允诺放弃那种特殊的共产党政策（如没收地主的土地），并把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原则作为他们自己政策的基础。实际上，实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比实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纯粹的共产党政策更能有效地赢得普通民众的支持。在土地改革这一关键问题上，共产党人把国民党中央政府在1930年曾经颁布过的一条法律作为自己政策的根据，即把主要农作物的地租限制在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国民党直到1949年撤退到台湾之后，才有效地实施了这一法律），并给予佃户许多保护，但这种保护并不使地主感到是不可忍受的。

一个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实现的重要的改革是税收制度。这个制度曾经既是无效的，又是不公平的。说它是无效的，是因为很多从纳税人那里征收来的税金不能到政府手里；说它是不公平的，不仅因为许多税款有税率递减问题，而且也因为存在广泛的逃税现象。据估计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逃过了土地税的登记。而这种土地税从规定上说是比较公平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山东的根据地里一直保留着地租。）

晋察冀边区政府首先使用的是被称为合理负担的税收制度。政府将要征收的赋税限额分给县，县再把它限额分给区，区再分给各村，村再按限额分到各户。这种制度是有效的和相当公平的，但这种限额的依据只是靠粗略的估计。第二阶段使用的是“统一累进税”。这是一种结合收益和财产的税收制度。这种结合对于不劳而获的收益规定要交较高的税款。一个收益完全由地租得来的家庭，比一个靠自己的劳动而具有同样收益的家庭交的税要多。我计算了1944年的比率，对一个贫穷的佃户家庭来说降低了5%，而对一个兴旺发达的地主家庭来说则要多出50%。这种对地租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政策在经济上促使地主把土地卖给他们的佃户，而把资本投入税收较轻的地方工商业中去。

中国在农村进行改革的早期努力曾经遭到失败，因为农村中的武装仍然掌握在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手中。晋察冀边区的改革是成功的，因为原来由地主控制的保安队，已经被村里的民兵

所代替，而民兵则受选举出来的村委员会控制。

的确，除了确定的政策外，政府信守诺言是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燕京大学有人告诉我，抗战前，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有政治背景，而他又想去外国获得一个学位，那么，通常他就会先去获取一个有如县长这样的职位。名义上县长一年只有合几百美元的工资，可是他却可以从一年的公务费中弄到足够的钱，以支付他去美国学习的经费。而当一个毕业生真的起到县长的作用，试图帮助他那个地区的民众时，满怀感激之情的民众就会为他建立一座功德牌坊。要赢得对任何政府的诺言都抱有怀疑的人民的真正支持，是要花些时间的。同样，要把来自形形色色的小抗日组织的成员和许多刚招募来的新兵训练成能干的战士，也是需要花些时间的。而1938年大部分时间，是进行这种军事训练的理想时机。这时，主动攻击日本人控制的铁路线的轻微战斗不太多，反击日本人对农村的规模较小的袭击也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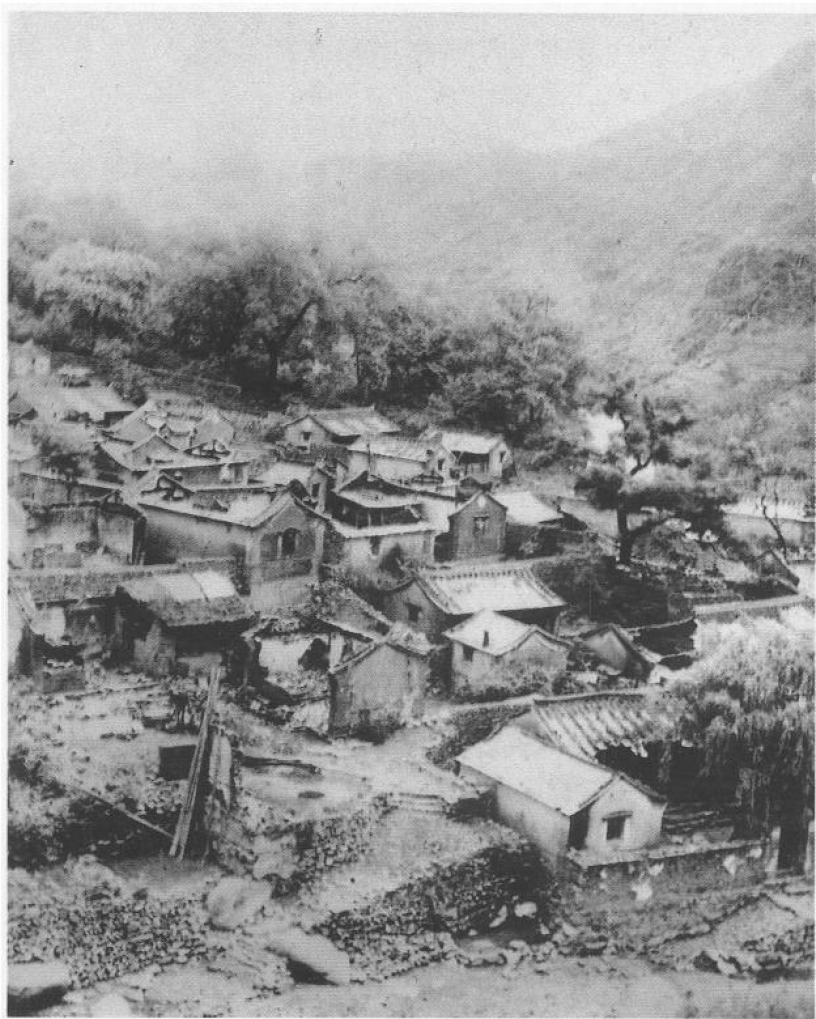
1938年10月，日军为最终控制华北农村发动了攻势。到1939年底，他们占领了除阜平以外的晋察冀的所有县城。阜平地处偏僻的山区，1938年在一次日军的扫荡中成了废墟。尽管如此，八路军并没有被消灭，从1938年起，他们逐渐强大起来，成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使日军不断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并遭受惨重的损失。在一次日军进攻这一地区的战役中，日军少将阿部规秀被八路军击毙。

在日军方面看来，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时间地延缓了对华北农村的军事进攻，这一点，我是1961年在东京和日本国民自卫队历史研究部门中的一些官员交谈时得知的。我详细地询问这个问题时，这些官员承认日军有计划的制造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但他们坚持说1937年7月的芦沟桥事变是出人意外的。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准备在中国发动一场更大的战争，也没有足够的现成的军队。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强化控制华北农村或者对付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正规部队之间进行选择，而且选择了后者，只留下第110师团警卫他们在华北的所有运输线。事实也是如此：在1938年9月以前日军的主攻目标是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在占领武汉和开封后，他们才把大批军队调往华北。

没有纪律的保证，是日军失败的又一个主要原因。1938年的夏天，一位八路军的军官对戴德华教授（George Taylor）和我谈到：在日本人没有到过的地方发展抗日队伍比较困难，然而，凡是日军到过的地方，当地老百姓都坚决支持抗日部队，因为日军肆无忌惮的进行抢掠、强奸、屠杀。我在延安时曾听说：山西有一个地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曾到过，当地有一个顺

口溜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日本人杀人多。”

日军官员也认识到纪律败坏造成的严重后果。1939年在冀西的一次战役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了日军的一个团部，他们从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份第110师团桑木将军给部下作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这样说：除非日军能够大大地改进对待中国老百姓的纪律，否则就会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显然他没有能够改变这一状况。我在同日本国民自卫队历史研究部门的官员交谈时，他们试图提醒我，有关日军暴行的报道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宣传”。我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强调说，日军纪律败坏似乎是由宪兵一手造成的。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完全赞



日寇破坏的山区村庄（1938年）

同这一看法。宪兵是牵涉到军政界的、权力极大的警察组织，没有任何一个一般官员敢同它作对。而且，他们极其腐败，已深深卷入了贩运毒品和其它方式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

日军素质的衰败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课题。以前在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曾以良好的纪律对待平民百姓和战俘，从而赢得了所有外国观察家的高度赞赏。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日军在这两方面的纪律已经败坏到臭名昭著的地步了。

日军素质比日俄战争时期下降的原因，曾被解释为那时的上层军官与后来的不同，他们来自有着传统纪律的武士道家庭。当然，这可以做为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还有两个普遍的原则可能更重要。首先一个原则是：当一个团体把维护它的团结和它的利益作为最高标准的时候，它就失去了过问那些有威望的极少数成员的能力。事实正是如此，那些身居要职的日本官员，包括天皇，对那些冒险者和疯狂分子的所作所为不闻不问，对于强硬的惩罚性措施会有损军队的良好声誉的主张，他们也从来不想去加以反对。而日军军方在北平举行的招待会上，每当外国记者提到日军暴行的报道时，日军发言人的标准回答就是原则上否认此类事情的存在，因为这种行为是同《明治诏书》有关军队纪律的阐述相



日寇在阜平烧毁的房屋（1938年）

矛盾的。另一个原则是：站在错误立场上的人，他们的行为也往往总是糟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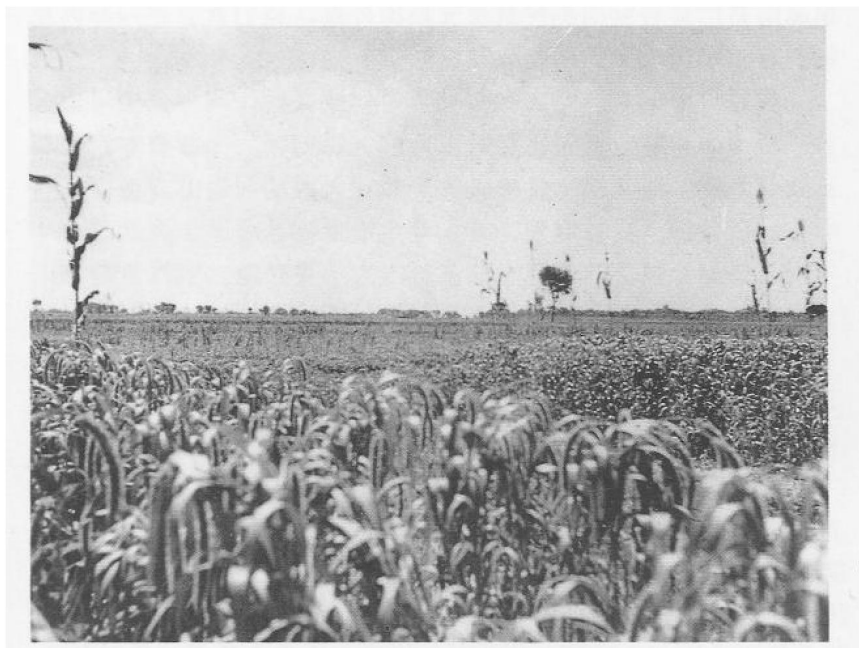
在1904—1905年间，日军会以从西方帝国主义手里解放亚洲作为借口为其进行的战争辩护，但是自从西伯利亚远征以来，日军领导人的确无法为自己的进攻目标作振振有辞的辩护了。任何一位日军军官只要认真思索并将“东亚新秩序”的高调口号和日军在当时的行为比较一下，都会无地自容。

1939年，日军对付八路军部队的主要办法是包围战术，而八路军部队则一直是很机智的避开包围。1940年，日军采取了一个新的策略。这个策略被认为是桑木将军研究了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中央苏区的办法后提出来的。据认为，国民党采取的碉堡制和封锁交通线的办法，最后迫使共产党放弃了南方的根据地，进行长征。

日军建立碉堡制和封锁交通线的战略，开始仅仅是为了保护铁路线，由此扩展到逐步蚕食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他们不再去包围共产党领导的主力部队，而是向根据地发动攻势，集中兵力摧毁那些还没有利用碉堡制和封锁交通线的手段控制的根据地。他们在所到之处，实行把房屋烧光、家畜杀光、粮食抢光或毁掉

的“三光”政策，还把抓到的村民送到日本人占领的东北去当劳工。

初期，在华北的八路军，除平型关大战外，还没有与日军有过其它更大的交锋。1940年8月他们发动了一次大的攻势，即“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占领了许多日军的阵地，捣毁了部分铁路。但这仅仅是暂时的胜利，不出几个月，日军就恢复了失去的地盘，并把碉堡修得更牢固。共产党某些官员在几年以后承认“百团大战”是一次错误的战役，为了一时的利益，而遭受了很大的军事伤亡，还耗费了很大一部分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1961年我碰到一位曾在华北日军司令部参谋机关负责的军官，他告诉我，他认为“百团大战”是中共一次较大的失误。最近，中共官方认为“百团大战”是彭德怀将军光辉业绩的一部分。当时其他一些领导人也赞成进行这次战役，是出于政治动机，就是为了使中国的舆论注意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可能同1940年3月建立的汪精卫亲日傀儡政权之间达成妥协。还有，当时国民党攻击中共不同日军打仗，“百团大战”则又可用来回击这种指责。在战争期间，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彼此之间常有许多争执。1938年抗日统一战线还能顺利的工作，那时鹿钟麟将军的部队曾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去接管河北南部，而那里的农村已早在这年春天就由共产党控制了。



冀中靠近铁道封锁线的农村（1938年）



八路军袭击日军碉堡（1938年）

共产党对鹿将军是怀有敬意的，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认为他有抗日的诚意，只是作战的组织方法太陈旧，抵挡不住1939年日军对他的猛烈进攻。而对鹿的部下张荫梧，共产党就很不满意，指责他是“曲线救国”论的最早鼓吹者。这个口号意味着与日本人合作去反对共产党。

有些人认为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他们之间的冲突。其实相当厉害的冲突早开始于1939年。在华北，同一地区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只有凭着相互间的高度信任，才可能避免磨擦。一旦日军增加压力，其攻势迫使某地的任何中国军队移动，就可能造成问题，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大不相同，不能互相兼容。而且，政治形势的变化削弱了地方上的相互信任。国民党领袖之一汪精卫的背叛，使共产党疑心国民党可能和日本人达成妥协。同时共产党完全赞同德苏协议也增加了国民党的猜疑，以为共产党会受苏联操纵。

国民党部队到1943年底没有大规模地在黄河以北出现过。国民党中央政府试图推行的军事组织和地方组织的标准形式，不适于抵抗日军猛烈的、接连不断的攻势。从1940年至1943年，华北的许多国民党部队都投降了日军，后来被编入汪精卫伪政权的伪军。在山东，也有一些残存的国民党部队，直到1945年才被共产党解决。这些部队一些实际组织特征上，同共产党部队极为接近。因为这些特征是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在反对拥有极为优越的武器的敌人时所必不可少的。

从1940年底至1943年底，日军逐步占领了华北，八路军大约损失了四分之一兵力，并失去了一些很富庶的地方。日军在这些地区推行“囚笼政策”，八路军被迫在根据地采取紧急经济措施和增加税收，以应付这一情况。

日军的碉堡制和封锁线战略的弱点是需要大量兵力。到1943年，日军在中国约有三千个碉堡，每个碉堡需配备约30人。那时日军一方面不得不将部队广泛分布，以备增援任何受到袭击的碉堡；另一方面仍然需要更多的部队去扫荡根据地。许多碉堡由于是由伪军把守的，因此也就远远没有起到作用。八路军能够同许多伪军部队达成彼此“互不侵犯”的协议。晋察冀的冀晋第三军分区黄永胜将军告诉我，他的部队需要袭击某个伪军据点时，要经司令部批准。

穿越冀中去铁路西面的根据地，要赶一夜的路，约有30英里。其中要通过一段封锁线，过路的人总是报告平安无事；有一次，一个八路军小队报告说有人开了枪，第二天，一个农民捎来

了伪军的信息，说因为日本人在身边，他们不得不打枪，但愿没伤着八路军。

一位我的无线电班的学生有一段类似的经历。他在冀中八路军小分队的时候，一次他们队的机枪坏了，于是就派一位农民捎信给当地的伪军据点，要求在修理机枪期间借一挺机枪。伪军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同意借给一挺机枪，只是要保证在十天之内归还。因为日军可能十天以后来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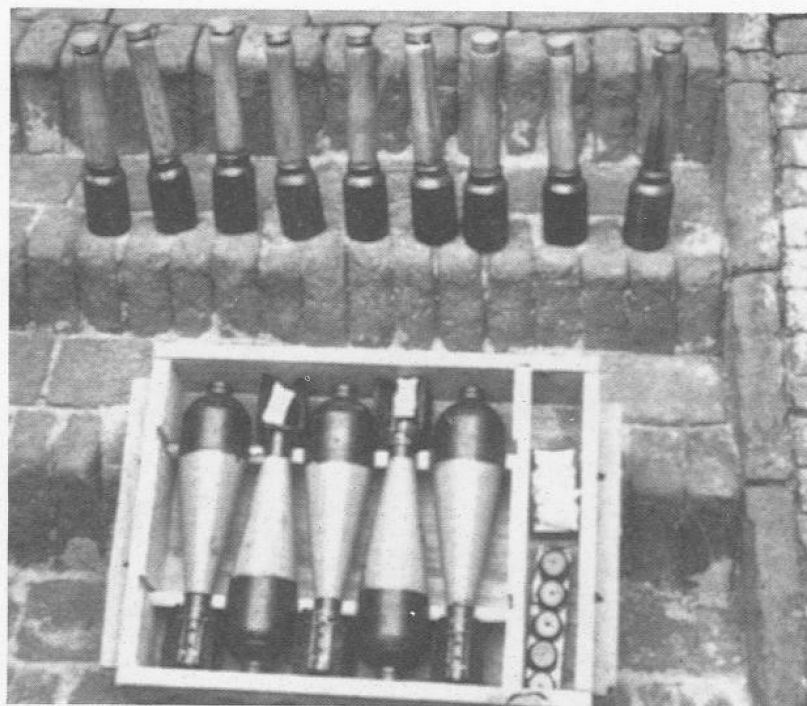
如果日军的堡垒封锁政策能多持续几年，或能用可靠的部队来镇守所有碉堡，他们或许会迫使华北的八路军转入地下，让那些数量很少的游击队上山打游击。日军在东北能够肃清公开的反抗者，就在于实行了把老百姓都集中在日本人驻军把守和设防的村子里。事实上，自从1943年以后，日军迫于太平洋战争的形势不得不从华北撤走一些军队时起，其整个战略就趋于崩溃了。在1943年7月，八路军仅仅控制了华北的两个县城，即晋察冀的阜平和平山。到1944年7月他们就控制了40多个县城。而到1945年，日军退回到他们在1938年初的阵地，只控制了几条铁路。

1967年我在日本时，访问了一位日军军官，他曾在太原的日军中负责情报工作。他记得的中文，足以使我们能完全自由地交谈。他分辩说，事实证明，日军在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打仗比美国在越南和越南共产党打仗更有战斗力。我回答说，如果八路军有象越南共产党得到的那种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我的话使他很震惊。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成果时，有一点要考虑进去，即1940年后，甚至还包括以前的一段时间，中共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外援，即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在山西的阎锡山方面也没有给他们以帮助。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枪是欧洲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制造的。弹药几乎完全靠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到战争后期，日本人的物资，也愈来愈缺乏。

一位军分区司令员告诉我，战士们要尽量节省弹药的消耗，只有当战士们当中有特别神枪手时，才允许这些神枪手战士在一百码以外射击。

八路军物资的供给除从敌人那里夺取外，还通过当地很小的、很原始的兵工厂来补充，这些兵工厂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才能。1938年，手榴弹的弹药供应很充足，而这些弹药则是由当地历史悠久的、制造烟火的手工业作坊生产出来的。这种手榴弹一般只能炸成两三个碎片。后来，一位辅仁大学化学系的教师张珍当了兵工厂的厂长，他采用古老的铅罐法制作硫酸，即用农民用来储存粮食的大陶缸做反应室。后来，能够制作硝酸，并用它来



根据地自制的手榴弹和迫击炮弹（1938年）



抗日部队使用的旧武器（1938年）

制造火药，使手榴弹和地雷有更大的杀伤力，并成为仅有的来源充足的武器。军需部门还设法制作一些步枪子弹，弹壳是用旧的铜币制造的，所以生产起来很费劲。

八路军对有些东西，象电话和无线电用的干电池，他们依靠那些有爱国主义思想或牟取高利润的商人从日军占领的城市走私。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也能制造某些型号的湿电池，但这也是相当困难的。

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其它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情形不同，它的特点在于供应几乎完全是自给自足。而与此同时的南斯拉夫铁托将军的军队和法国的抵抗运动，都是依靠英国和美国的空投得到武器装备。后来的越南南方的共产党不但可以从越南北方得到稳定的、不断增加的援助，并且还有可以撤进中立国老挝和柬埔寨的有利条件。在根本没有外界援助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被称作当代最有战斗力和抵抗力的胜利战争。

与东南亚共产党的革命相比，中共在华北所处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不利于游击战争。除山西西北部分地区外，这里的山区确实是荒凉的，而且没有道路，山是光秃秃的，根本不象越南和马来亚的游击区那样，覆盖着茂密的丛林。更有甚者，冀中是一马平川，只要不是雨季，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容易推进。

在东南亚，游击队在野外最必要的只是个简陋的遮雨棚，那就相当舒服了。在中国北部的冬天，房子和取暖是两个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在平原上，从十二月到二月，夜间温度处于摄氏零度以下。山区的冬天很长，延安的最低温度能达到摄氏零下十四度。日本人承认这种气候条件给他们在东北镇压那些公开的反抗者帮了很大的忙。一旦他们把人都集中到设防的村子里，并把其他所有房子都毁掉，游击队就很难生存。

但八路军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真诚的和积极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这种艰苦的条件所造成的困难。不同于越南和马来亚共产党的是，他们不需要用强制手段来得到人民的合作。他们是怎样得到这种支持的，后面将作详细的叙述。

燕京大学，1937

我和中国的关系开始于1937年，几乎可以说是偶然的。当时，我刚结束了南威尔士第二工业调查所所长助理的工作，正在找另外的工作。事有凑巧，这时燕京大学的社会系主任吴文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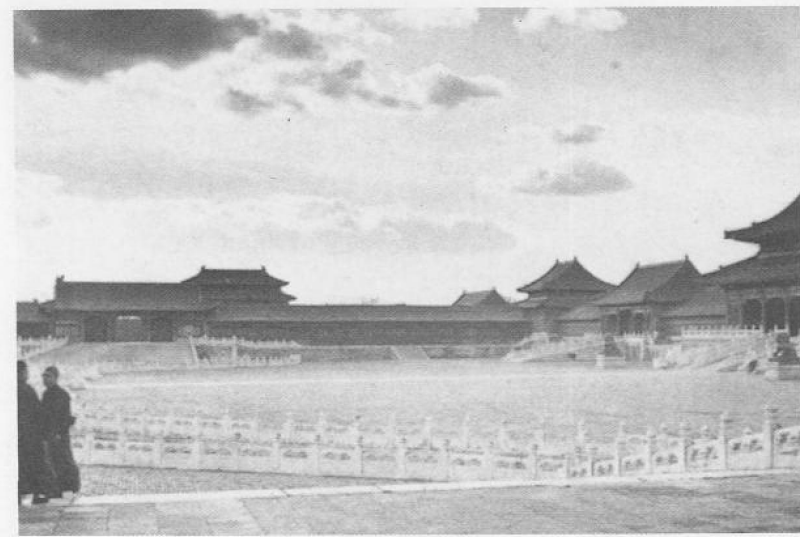
授，正想作一个按照牛津大学式的导师制的实验。导师制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基督教燕京大学资金委员会，该会的资金来自美国的个人或团体的捐款。吴先生来到英格兰，想物色两个人来帮助他开始这一实验。他很快就聘请了已在中国执教的戴德华先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选。第二个人选可就颇费周折了，他向奥勒索学院的校长亚当斯先生(Warden of All Soul, W.A. L. Adams)请教。正好亚当斯先生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他知道我正在物色合适的工作，他建议我去燕京大学，因为我是牛津大学导师制毕业生，对导师制的一切都熟悉，并且因为这是在中国大学初次试办，应该是很有兴趣的工作。

惭愧的是，当时我对中国没有深切的了解。当然我知道中国处在东亚、她的历史、她被日本一连串的欺压等等，但是对详细地了解中国及中国广大人民来说，我是偏于肤浅的。正因为我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事情不多，所以我马上就觉得到中国去特别有意思，并且我没有任何偏见的心理包袱，这就便于我更好地去观察和了解中国。我对燕京大学的无知远胜于对中国的无知。后来我知道，在美国，燕京大学是和清华、金陵、复旦等大学一样同享盛名的。在中国虽然战争已经开始，而且燕京大学将来是否能存在下去，似乎也会是个问题，但我还是毫无顾虑地决定从英国绕道美国，而后航行去中国。在美国我可以参考几个已有的实行导师制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经验，他们的实验研究，是会有助于我将来在燕京大学进行的导师制工作的，因为燕京大学和中国其他的大学一样，其制度如学科及行政机构的设置等，是取型于美国的大学的。最后，我于1937年12月离开美国去中国，从温哥华坐船到横滨，然后穿过朝鲜和中国东北，抵达那时叫北平的北京。一位成了我的朋友的朋友的轮船伴侣是诺尔曼·白求恩医生(Norman Bethune)，他现在在加拿大已经成了民族英雄。我们在横滨分手时，没敢期望我俩有再见面的机会，因为我是去日本人占领的北平，而他是去抗日根据地。

有关导师制的实验是有趣的，学生是从一场竞争性的考试中挑选的，他们似乎乐于这种实验。我们预料，当我们发展到把学生招满的极盛时期时，我们的教师和学生的比率也只会稍高于其他大学。当然，采用美国制的班级里的学生人数，比我们采用的导师制的小班级里的学生人数要多得多，但是，采用导师制的班级的等级和声誉，要求导师们在管理上花更多的时间，导师们要负责使学生的学习成绩够得上优良。造成导师制花钱多的原因是需要受过更高级训练的导师。一位大学讲师可以教一门美国式大学的课程，但一位导师得具备回答学生们提出的一般性的任何一



古都北平的故宫（1938年冬）



古都北平的故宫（1938年冬）